

◇◇ 通识教育·名校·名师·名课系列 ◇◇

国史精讲

◇ 樊树志 著

Guoshi
Jingjiang

復旦大學出版社





志著

国史精讲

*Guoshi
Jingjiang*

◇◇ 通识教育·名校名师名课系列 ◇◇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史精讲/樊树志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8

(通识教育·名校名师名课系列)

ISBN 978-7-309-05563-4

I. 国… II. 樊…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IV.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1685号

国史精讲

樊树志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285千
版次 200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 ISBN 978-7-309-05563-4/K·200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上课的情景

目 录

第一讲	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1
	① 古人类的起源	1
	② 石器时代	5
	③ 炎帝、黄帝与传说时代	11
第二讲	夏与商——历史时期的开端	17
	① 探索中的夏文化	17
	② 从“大同”到“小康”	21
	③ 商的起源与盘庚迁殷	24
	④ 青铜文明与甲骨文	28
第三讲	西周与春秋——Feudalism 时代	33
	① 周朝的建立与“制礼作乐”	33
	② “封邦建国”：“封建”的本意	38
	③ 老子与孔子	41
第四讲	从战国到秦——中华帝国的建立	47
	① 各国的变法	47
	② 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	51
	③ 秦始皇：皇帝制度与帝国体制	59
	④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62

第五讲	西汉与东汉——帝国规制的完备化	66
	① 黄老思想与无为而治	66
	② 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	70
	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74
	④ 王莽托古改制	78
	⑤ 光武中兴	82
	⑥ 丝绸之路	86
第六讲	三国与两晋——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	92
	① 三国鼎立	
	——曹操与诸葛亮	92
	② 西晋:从“禅让”到“八王之乱”	98
	③ 东晋:北伐与偏安	102
	④ 魏晋风度与玄学	105
第七讲	北朝与南朝——走向再统一的时代	111
	①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111
	② 北魏的改革与汉化	116
	③ 门阀政治	121
	④ 佛教艺术	126
第八讲	从隋到唐——帝国的再建	131
	① 隋的统一与创制	131
	②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39
	③ 从武则天到唐玄宗	147
	④ 盛唐气象	151
	⑤ 长安: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157

第九讲	从晚唐到五代十国	167
	① 安史之乱	167
	② 藩镇割据与刘晏、杨炎的改革	172
	③ 宦官与党争	176
	④ 五代更迭,十国割据	180
第十讲	北宋——划时代的新阶段	187
	① 北宋的官僚政治	187
	②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193
	③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	200
	④ 巅峰状态的科学成就	206
	⑤ 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211
第十一讲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	219
	① “靖康耻”与岳飞抗金	219
	② 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	227
	③ 朱熹的新儒学	234
第十二讲	元——蒙古建立的王朝	239
	① 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	239
	② 混一亚欧的大蒙古国	245
	③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元朝	248
	④ 对外交往的扩大	254
第十三讲	明——中华文明的余晖	259
	① 朱元璋与皇权的强化	259

② 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	265
③ 海上走私贸易与倭寇·····	272
④ “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277
⑤ 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283
⑥ 张居正与万历中兴·····	290
⑦ 从东林到复社·····	295
第十四讲 清——末代王朝的兴与衰 ·····	302
① 清军入关与南明抗清运动·····	302
② 从顺治到康熙·····	308
③ 雍正：“为治之道在于务实”·····	314
④ 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军机处·····	319
⑤ 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323
⑥ 乾嘉学派·····	328
⑦ 从海禁到闭关·····	334
后 记 ·····	341

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I 古人类的起源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但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却非常漫长。

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要的重大课题。人类是由一种古猿演变而成的。人类从古猿分化出来,大约经历了1000万年的时间。1000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500万年前,有了人类家庭中原始人类的留世遗存。在古人类的考古史上,1000万年和500万年这两个基本分界之间的时期,人类始祖与猿分离,向

原始人类演进。然而,这只是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有关这一演进过程的实物证据十分罕见。

20世纪发现的最早人类是“东非能人”。它是肯尼亚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 1903—1972年)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瓦峡谷发现的。“东非能人”的体质形态比南方古猿显得进步,但比以后的直立人显得原始。它能两足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石器工具,因此被判定为最早的人类。

路易斯·利基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到非洲的肯尼亚,在内罗毕附近一个非洲人部落长大。有志于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科学假说的他,1931年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峡谷发现了古人类骨架,当时断定为非洲最早的人类。1959年,他的夫人玛丽·利基在奥杜瓦峡谷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津吉人”的头盖骨,它的年代距今约175万年。这一发现不仅使利基夫妇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推进了古人类学和人类起源的研究。1978年,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腊妥利发现了距今约380万年到359万年的原始人脚印。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利基则于1972年发现了距今约18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以后又发现了距今约16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和头盖骨。1994年,理查德的妻子米芙·利基在距今410万年的遗址中找到了最早的原始人的遗迹。利基家族为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假说,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

2002年,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非国家乍得发现了距今700万年左右的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图迈人”。根据专家的研究,“图迈人”明显地表现出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双重特征:它的脑壳仍然像猿类,不过脸形短,牙齿尤其是犬齿比较小,类似现代人的牙齿。由此,专家们推论,它或许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如所周知,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是元谋人,还有蓝田人和北京人。虽然时间晚于非洲,但是科学界对于中国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

洲,颇有争议。

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700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

在中国的大地上,至今还没有发现“能人”的化石;所发现的最早人类属于直立人,即通常所说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及和县人等。

大约距今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属于早期智人的,是中国的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以及马坝人等。与欧洲的克鲁马努人同属于晚期智人的,是中国的柳江人、资阳人和山顶洞人等。晚期智人即通常所说的“现代人类”。此前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大都灭绝,只有晚期智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形成了现代人类的三大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

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国际人类学界有两个学派、两种理论,即“多区起源论”和“单一起源论”。

多区起源论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当然也不否认,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区的人类基因交流。

单一起源论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一种理论,它主要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张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称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简言之,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20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就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和亚洲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12000条染色体的研究成果,在东亚

人身上发现了79000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6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对于上述理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1988年美国《新闻周刊》把“夏娃理论”作为封面,引起轰动,成为该年度最畅销的一期。1993年,“夏娃理论”作为最新研究成果,在日本专门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但是,它也遭到西方一些学者的非议。他们指出,现代中国人和大洋洲人乃至欧洲人,都分别类似于本地区的古人类,而并不类似于非洲古人类。更重要的是,在地球的每个地区,都已经找到这个地区现代人类与该地区古人类之间的联系。

“夏娃理论”在中国也遭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众多的出土化石表明,存在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例如,蒙古人种在头骨形态上,从直立人到现代人都存在着矢状脊和印加骨,都表现出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上颌颧突等性状;在牙齿形态上,都具有铲形门齿与双铲形门齿,以及上颌门齿中断沟与下颌臼齿转向纹,还有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特征。此外,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与直立人及智人相对应)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当地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了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当然,吴新智等学者也不否认人种之间存在互相交流的现象。从直立人开始的中国史前人类及其文化,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自成一体地发展起来的,也不完全排斥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基因交流及文化往来。但这并不表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是非洲人。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柳江人年代进行重新测定,结果表明,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7万~13万年之间,而不是原先所认知的3万年。这意味着,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比人类学家原先所认知的更早地生活在华南地区。同时表明,中国的现代人类的起源不晚于非洲和西亚,这就显然不支持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美国《科学》杂志于2001年5月刊登由中国和外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论文宣称,通过基因研究得出结论,东亚人的祖先不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而是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他们于3.5万~8.9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东亚地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7万~13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在华南地区生活了,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在中国境内,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以及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科学的真相究竟如何,人们仍将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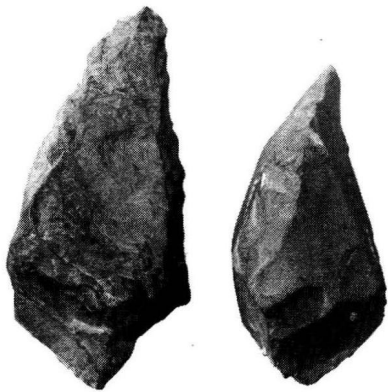
2 石器时代

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器质,把人类早期的历史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石器时代一般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击石器为标志,从二百万年前开始,到一万年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工具的制作一般是把一块大石头或燧石打成石片,所剩的石核用来

作为石斧。到旧石器时代末期,石片被用作石刀或矛头。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由于地域或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有相当大的差异。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丁村人文化)

发现于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的西侯度文化,距今约180万年,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古老阶地上。出土的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的石器,其制作方法包括锤击、砸击、碰砧,石器种类有刮削器、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西侯度文化的发现,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以

及人类用火的历史。

发现于贵州黔西县沙井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有明显的差别,但在个别因素上又有相似之处。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存,如贵州桐梓岩灰洞、兴义猫猫洞的石器都可能与观音洞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分别是中国南方、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两者之间的差别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同地区的文化已显示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

旧石器时代中期可以丁村人文化为代表。生活在汾河流域的丁村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仍是木器和石器。他们从河谷和山沟里采集砾石,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成各种砍砸用的石器。他们把石灰岩的厚而平的砾石,打制成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以供打猎之用。丁村人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石片石器,除单边刃和多边刃的砍砸器,还有尖状器、刮削器。丁村人的石器和西侯度遗址的石器有某些共同点,表

明了两者之间的发展联系,但是,从石器的种类来说,丁村人的石器有了显著的增加,制作技术也有大幅度提高。丁村人不仅在体质上比北京人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石器制作上也比北京人有了相当的提高。

旧石器时代后期可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从山顶洞人制作的装饰品,可以推测他们已经使用相当进步的石器,因为这些装饰品的制作必须经过选材、打制、钻孔、研磨、着色等工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顶洞人已能制作骨针,针身圆滑,针尖锋芒毕露,针眼窄小。骨针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能缝制兽皮衣服。山顶洞人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渔猎,以采集作为辅助手段。他们获得食物后带回洞穴,燃起篝火,御寒并烧烤食物。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小石珠,五颜六色,反映了原始艺术所达到的水平。山顶洞人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他们共有的财产就是周围可供狩猎、捕鱼、采集的自然界,就是他们的集团自身。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分为“上室”和“下室”,上室是公共住地,下室是公共墓地。墓地死者身上的赤铁矿粉粒和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对生命和灵魂的一种虚幻认识。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最后的10万年尤为重要,技术的进步是根本性关键。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带柄斧、梭镖、弓箭,延长了人的手臂,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的发明,不仅解决了皮衣的缝制问题,而且可以御寒,人们才可能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另一个大陆,走向世界各地。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骨针
(山顶洞人文化)

一书中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4万~7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农业起源，农牧业的分工，以及农牧业代替渔猎而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分，随之出现了定居的村落——人类最早的聚落。进而发展到陶器的制作，家畜的饲养，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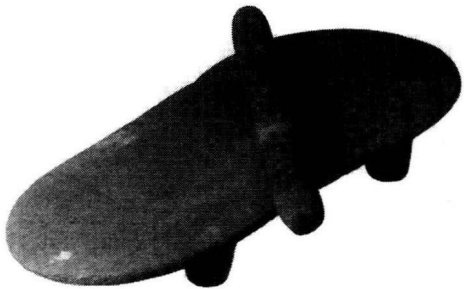
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以及陶器、纺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生产经济阶段。在此以前人类只是食物的采集者，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食物的生产者。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间或还有剩余。这种生态环境使人口可以较快增加，生活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这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的重要性与深远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分。由“采集食物”进至“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把这场革命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生活方式，以及制陶、纺织、建房等新生产方式。考古学家伍德(R. Braid Wood)根据碳14测定，推测农业的诞生时间距今约1万~1.2万年之间，其发生地点在近东的两河流域。

近人的研究证实，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并非两河流域传入。大量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一体的。黄河流域是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的发源地。

七八千年前的人类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有所发现，它们同中有异，显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的裴李岗文化，约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900年的农业聚落遗址，有房基、灰坑、陶窑，有石器、陶器、骨器工具及生活用品。石器以农具为主，包括耕作、收割工具——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陶

窑的发现足以证明,制陶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以泥质红陶为主,夹沙红陶次之。陶器有杯、碗、盘钵、双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等。由此可见,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已进入了以栽培粟为主的旱地农耕阶段。



石磨盘、石磨棒(裴李岗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而分布在这里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引人注目。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现已发现属于这一文化的大量遗址,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延伸至附近地区。西安郊区的半坡遗址,是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4200年间的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区、制陶窑场和公共墓地。居住区周围有一条宽深各5~6米的壕沟,用于防卫。沟北边是村落的公共墓地,东边是窑场。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窖穴,是村落的公共仓库。在居住区大量房屋群中,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是公共活动场所,节日和宗教性活动都在此举行。村落中的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互相协作,一起作息,过着平等而和睦的生活。

陶器是继原始农业出现之后发明的,农耕与陶器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符号二三十种,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而且从陶器上的图形纹饰推断,当时可能已有象形文字。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